

源起·要义·启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探微 ——基于《新民主主义论》的文本考察

苑程杰¹ 马泽轩²

(1.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海淀 100044, 2.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北京 西城 100044)

摘要: 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础之上, 将中国革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 创造性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思想。《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抗战时期毛泽东的重要著作, 较为完整地蕴含着毛泽东关于新文化的相关理论, 标志着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初步形成。其中所蕴含的关于意识形态本质、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意识形态功能等丰富的思想内容, 是植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意识形态创新理论, 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彰显出毛泽东思想跨越时空的思想张力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 意识形态思想; 《新民主主义论》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14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毛泽东 1940 年 1 月 9 日于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 经过修改和补充后在《解放》第 98、99 期合刊发表时改为《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关键著作, 《新民主主义论》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三大领域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其中, 关于新文化的完整阐述更标志着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形成。

一、思想源起：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

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阐发最早见于他的博士论文; 在《德法年鉴》时期产生了意识形态理论的雏形;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明确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 并就意识形态进行了完整阐述; 在《资本论》的准备、撰写与成书时期, 真正切入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

第一, 《德法年鉴》时期,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 “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 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 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1], 马克思从德国现实出发所批判的这种作为颠倒的世界观的宗教, 正是在落后于同时代的德国现实基础上所产生的和反映的一种观念上层建筑, 即一种颠倒的意识形态雏形。同时, 马克思指明了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即现实活动的作用, 即“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9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 马克思一方面在批判鲍威尔政治解放观念的狭隘性的同时, 另一方面也揭露了人的解放问题的实质是其背后所矗立的当时市民社会中异化为货币拜物教的犹太精神, 是反映犹太人世俗生活利己主义的意识形态。

第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第一次明确使用“意识形态”(Ideologie)概念, 并进行完整阐述。其一, 从内涵理解, 意识形态首先是以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 为落后的德国现实辩护的德国哲学。同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1]46。其二, 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理解,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52, 意识形态作为现实世界在观念上的反映, 内在、本质地受市民社会及经济基础所决定和制约。其三, 从阶级立场理解, 意识形态作为市民社会在观念上的反映, 必然是具有一定阶级属性的。

第三, 在《资本论》的准备、撰写与成书时期, 马克思真正切入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该时期, 马克思

作者简介: 苑程杰(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马泽轩(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通讯作者: 苑程杰

思所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61-1863 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第一卷等,标志着马克思的思想从哲学批判彻底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概言之,马克思中后期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经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批判中。

二、理论探微:抗战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内涵要义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工作中。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思想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是契合中国实际的意识形态学说。

(一) 关于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思想

对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掌握,首先需明确意识形态内在的阶级属性以及阶级附归的特性。毛泽东立足于抗日战争时期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特别是被压迫阶级,指出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阶级归属应该也必然是无产阶级。

1.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阶级归属是无产阶级。其一,无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必要性。在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判定中,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2]668}。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在文化上的反映也必然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无产阶级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必然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阶段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阶级归属也是无产阶级。其二,关于无产阶级掌握文化领导权的任务,毛泽东认为要“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进而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2]698}。

2.始终贯彻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领导,对于中国革命在政治路线上的正确指导以及在思想文化,特别是在新文化领域的绝对领导,是抗日战争走向伟大胜利、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核心因素。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决定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在中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2]674},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才能承担起资产阶级所不能承担的责任,领导人民驱逐帝国主义、实施民主政治;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才能以先进的理论指导和坚定的信念信仰,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在意识领域形成强有力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号召力。

(二) 关于构建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民主主义“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2]665}因此,新文化同时也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立意味着旧民主主义话语范式的扬弃以及新话语体系的建构。

1.立足中国革命现实,扬弃旧式民主主义的话语范式。其一,旧民主主义话语范式扬弃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发生了性质上和领导阶级上的转移。毛泽东指出“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2]667}。其二,对旧民主主义话语范式扬弃的核心是中国革命的“两步走”理论。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认识,正是对旧民主主义话语范式的突破。他指出,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已经发生改变,“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2]666}其三,扬弃三民主义话语逻辑。“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2]693},中国革命实际的改变意味着指导中国革命的话语体系也必将由此发生变化。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而言,毛泽东认为不落实联俄,中国就无法在抗战阶段站在社会主义苏联方面与帝国主义抗衡;不落实联共,虚假的旧的三民主义者就会成为汉奸沦为日寇的傀儡;不实行农工政策,就不能真正地唤起民众投身革命。

2.植根人民群众,以大众化语言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毛泽东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就已经通过社会调查清醒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3]21}。然而,农民因其阶级地位无法接受到系统教育,因此,如何让厚重的理论内容深入农民阶级,是一个关键问题。毛泽东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2]708},中国革命若想胜利,抗日战争若想成功,必须将科学正确的理论以大众化方式进行阐发,破除理论隔膜,构建属于人民大众的通俗易懂的富有生动气息的新民主主义的话语体系。毛泽东在思想宣传和理论写作中就深入贯彻了

这一方法。面对资产阶级顽固派,毛泽东指出务必要尽早觉醒,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也”;面对封建地主,毛泽东指出“有饭大家吃”^{[2]683};在论述对待文化的态度时毛泽东又灵活比喻,巧妙地把文化产品比作食物,指出“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2]707}。综上所述,新的符合现实的符合人民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2]708}。

(三) 关于意识形态功能的阐发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社会变革的动力。毛泽东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性,认为它不仅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更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

1.意识形态因其阶级性具有文化革命功能。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属性决定党的意识形态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时所必然具备的文化革命功能。“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2]663}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政治生力军,意识形态领域与文化领域的革命力量也必然是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生力军。第二,关于“文化革命”的必然性。“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2]695}第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革命”的目的。毛泽东在针对时局之中国的历史特点进行阐发时指出,“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2]665}。第四,文化革命必须具有相应的革命理论阵地。例如,《向导周报》《民国日报》等“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2]701}。

2.意识形态因其所属阶级的先进性所具有引领指导功能。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反映了一定阶级的利益并通过其理论、价值观、道德准则等形式,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和指导作用。这种功能体现在意识形态能为社会提供思想指导和精神动力,塑造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意识形态被视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统治地位和利益的思想工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强调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认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科学的、革命的,能够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意识形态要发挥其引领功能,“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663}论及意识形态之于革命事业胜利的引领与指导作用,毛泽东指出:“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2]706}。由此得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意识形态对中国革命现实具有科学正确的引领作用。

三、以文鉴今:抗战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当代启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时期不断推进和实现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在该进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使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积累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经验,在今天依然具有跨越时空的思想张力以及丰富的价值启示。

(一) 扭住关键:坚决落实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权

在抗日战争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领导,对于中国革命在政治路线上的正确指导以及在思想文化,特别是新文化领域的绝对领导,使得抗日战争走向伟大胜利,使得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第一,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巩固马克思主义之“魂脉”。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4]100}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引领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旗帜。只有通过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在思想根源上筑牢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坚定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第二,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还需毫不动摇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并坚持把中国革命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即今天所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恩格斯在其晚年书信往来中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绝非教条,不是背诵的一成不变的理论,而是指导革命、指导认识世界以及改造世界实践的能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落实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一

方面要坚持党的指导思想的毫不动摇,另一方面要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方针的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局势发生了变化,因而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所发展的、与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同样会发展变化。究其根本,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顺应时代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才能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二) 话语建构:以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巩固意识形态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4]35},由此可见,只有牢牢夯实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塑造和发扬主流舆论新格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才能有效提升正向意识形态传播能力,巩固和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第一,推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世界历史深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下,近代以来世界落后国家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后发国家在开展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免处于西方话语体系的范式之中。谁掌握舆论,谁就掌握主导权。在国际舆论环境中,只有通过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的建构,才能破除西方话语意识形态垄断的遮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的重要立足点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激活并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在“两个结合”中创设出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文明倡议”等能够准确表达中国立场、观点和主张的标识性概念、范畴以及表述。

第二,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传播能力。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一方面需要话语内容,另一方面还亟需行之有效的传播手段。新一轮科技革命使得当今社会跃迁至以人工智能技术为赋能的数智时代。在豆包、DeepSeek、KIMI+等生成式AI技术的支持下,应当提升网络AI应用的甄别能力,利用大模型、高算力整合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资源,形成全媒体传播格局,结合新媒体的即时性、互动性特点,即时监控舆论动向,回应社会关切并引导正确走向。同时,培养一批既懂理论又擅长传播的专业人才,让中国声音能够更好地被国际社会听见、听清、听懂。

(三) 文化引领: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以激发先进文化引领力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各大大国……围绕网络空间发展主导权、制网权的争夺日趋激烈”^{[5]41},只有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型凝聚力,牢固掌握党的宣传文化思想工作的主动权,在“两个结合”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才能进而行之有效地在意识形态领域有力驳斥“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意识形态弥彰。

第一,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两个结合”的生动实践,代表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文化向度深入发展的结果。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概括凝练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本质特征,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等问题。其中,“新的文化生命体”以其所蕴含的“天下为公”“君舟民水”的人文情怀昭示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独特性;以其“国之富者在乎丰民”的发展逻辑契合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以其“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重要命题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基本要求,以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丰富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文明底蕴;以其“和合”的社会思想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道路意蕴。

第二,以新的文化生命体驳斥“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一方面,“新的文化生命体”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驳斥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不适今,古今断裂”的有力破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不是凭空出现、一蹴而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文化形态也不是全新孕育、无根生发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吸收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伟大经验而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则同样是在贯通古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概言之,“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理论的一部分,整合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古”与“今”,从根本上对西方所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和驳斥。

另一方面,“新的文化生命体”对“文化虚无主义”的驳斥就是进一步对“西方中心论”“现代化=西方化”等错误思潮的破解。“西方中心论”作为一个持久出现并受到广为讨论的文化概念,对其最普遍、确切的理解即它是发端于西方近代工业革命、丰富于西方世界殖民扩张实践、广泛传播于当代国际文化交往与输出间的一种以西方为尊、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适价值”。“新的文化生命体”既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理论的生动实践,更是相对于世界文明花

园中的一朵靓丽鲜花。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有利于以高度的文化自信破除文化虚无主义，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守正创新的姿态，使独立的民族特色消解“西方中心论”所宣扬的中西文明对冲，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贡献独属于中国的智慧与璀璨的文明成果。

综上所述，“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两个结合”的生动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化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文化向度的建构提供了深厚的精神动力与思想资源。只有以中国特色的叙事逻辑和话语体系，才能进而化被动为主动，在中国故事、中国声音的正向传播中巩固意识形态主导权。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Origins, Core Tenets, and Implications: A Probing Analysis of Mao Zedong's Ideological Though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A Textual Exegesis of On New Democracy

Yuan Chengjie¹, Ma Zexuan²

(¹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² School of Marxism, Party School of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Marxist ideological theory, Mao Zedong integrate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to Marxist theory and thereby Sinicized it, creatively constructing an ideological system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a pivotal work of Mao Zedong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On New Democracy contains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presentation of his theories concerning the "new culture" and marks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ideological thought. The rich ideological contents embodied in this work—including perspectives on the essence of ideology, ideological leadership,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deological discourse system, and the functions of ideology—constitute an innovative ideological theory rooted in the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is theory not onl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the system of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e trans-temporal ideological vitality and practical value of Mao Zedong Thought.

Keywords: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1931–1945); Mao Zedong; Ideological Theory; On New Democracy